

敦煌學·日本學

唐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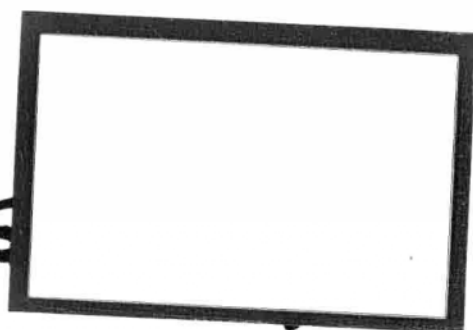
续编

[日] 石塚晴通 編
唐 炜 译

DUNHUANGXUE
RIBENXUE
XUB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敦煌學·日



海錄子



续编

[日] 石塚晴通 编

唐 炜 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学·日本学:续编/(日)石塚晴通编:唐炜
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6-3958-8

I. ①敦… II. ①石… ②唐… III. ①敦煌学-文集
②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870.6-53 ②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8537 号

特邀编辑 薄铁炼
责任编辑 竺金琳
装帧设计 汪 溪

敦煌学·日本学(续编)

(日)石塚 晴通 编 唐 炜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5 字数 450 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958-8/K·911

定价: 6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序

2005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学·日本学》，使笔者感到幸运的是此书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好评。如今一晃七年过去了，在笔者迎来古稀之际，知人、友人、学生聚会之时，谈到了要出版一本古稀纪念论文集的话题，并很快获得了出版《敦煌学·日本学》之著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彭卫国社长和王圣良编辑的承诺，决定将其作为前著的续编出版。前著主要是吸引了关心敦煌学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学方面的中国学者的兴趣。鉴于此情况，现将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编译后介绍给中国学者，想必会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青睐。此书本着这种想法收录了笔者四十多年来的代表论文作为笔者的古稀纪念论文集，此次用中文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确实感到有些惭愧。不过这些论文同时也是笔者从年轻时至今（七十岁年龄）的见证人，同时对笔者来说，也可面对现实对自己过去的论文作一番更深刻的回味。

敦煌学部分，以笔者四十五年前写的敦煌学论文作为序幕，并精心挑选了小助川氏近年来从国际视野的角度结合汉文训读资料，并在汉文训读资料研究方面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论文作为主要部分。在日本，仅平安时代（8 世纪末—12 世纪末）汉文训读资料就有 4000 多件，时人就是利用这些资料立足于日本语文言文的研究。通过敦煌本训读资料的研究，会对中国文言文的研究大有裨益。除训读资料、敦煌佛典本及有关研究论文以外，落合俊典氏的研究论文也收录于本书，在日本他的敦煌佛典文献研究曾有过飞跃式的发展。此外，谈到汉文古写本就会联想到拥有敦煌本数量极多的日本正仓院本。关于正仓院事务所所长杉本一树的纸的研究的论文也收录于本书。

日本学部分，主要收录了利用 7 世纪以来日本所藏的丰富的原本文献资料撰写的实证论文。从收录汉文训读资料开始，划时代、纵横广阔领域的汉字、汉文的研究论文均被收录。尤其是在汉字方面，利用以笔者

为代表的“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HNG)”(自2005年3月以来公开于网络,不断增补)做出成果的当山论文、齐木论文,拥有庞大的汉文拓本文字数据库的安冈论文等也收录于本书。在汉字的古字(辞)书方面有池田论文、西原论文(敦煌学的部分)、大槻论文等和日语方法论等论文。

无论是敦煌学,还是日本学方面,所收论文均在日本学界受到好评。如果此书能呈献给不懂日文的学者并能在学术上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的话,笔者将感到无比欣慰。

2012 年秋
石塚晴通识

执笔者一览(以论文顺序排列)

编者

石塚晴通 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编译者

唐炜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讲师、文学博士

执笔者(2012 年所属)

丰岛正之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教授
西原一幸	金城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红林幸子	书法家、北海道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文学博士
冈墙裕刚	常叶学院大学教育学部专任讲师
安冈效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赤尾荣庆	京都国立博物馆学艺副部长、研究员
小助川贞次	富山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高田智和	国立国语研究所副教授
当山日出夫	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
齐木正直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文学博士
池田证寿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贾智	九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杉本一树	正仓院事务所所长、文学博士
杨琳	中国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槻信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副教授
白井纯	信州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渡边さゆり	札幌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
吴美宁	韩国崇实大学校副教授、文学博士
李运博	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朴均辙	韩国全州大学校教授、文学博士

目 录

序 /1

敦煌学编

石塚晴通:楼兰、敦煌加点本 /3

石塚晴通:本行至割注的文脉连续的表记形式——有关以古事记为主的上代文献以及中国中古时期文献 /37

石塚晴通:有关中国周边诸民族的汉文训读 /61

石塚晴通:敦煌写经研究的目前状况 /68

石塚晴通、池田证寿、高田智和、冈墙裕刚、齐木正直: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HNG)活用——汉字字体与文献的性格 /72

杉本一树:正仓院宝物特别调查——关于纸张的(第二次)调查报告的前言 /88

赤尾荣庆:古代写经的字形 /99

落合俊典:金刚寺圣教的构成与近年新发现的写本(要旨) /108

小助川贞次:作为东亚汉文训读资料的敦煌加点本的意义 /111

小助川贞次:敦煌汉文文献(汉籍)的性格与其汉字字体 /127

西原一幸:字样研究史 /150

贾智:试论《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中唐代字样的利用 /170

山田健三:宋版一切经附载音释(要旨) /190

日本学编

石塚晴通:汉字文化圈中典籍资料的累积,国际性的传播与继承——以高山寺本为例 /197

红林幸子:书体与书法 /209

杨琳:中国古代的扫帚星信仰 /219

唐炜:关于《西大寺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汉语复音节词的训读问题 /238

池田证寿:宋版辞书在院政、镰仓时代寺院社会的流通及影响——以《类聚名义抄》为例 /257

大槻信:古辞书与和训——《新撰字镜·临时杂要字》/270

渡边さゆり:关于冷泉家时雨亭文库藏《文选》卷二中的训点 /291

当山日出夫: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长恨歌》中的汉字字体——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应用事例 /310

齐木正直:通过 HNG 的利用试论亲鸾、明惠字体 /326

吴美宁:关于日本论语训读和中国方面注释书的关系——通过论语集解本和论语集注本的比较 /338

丰岛正之:翻译的载体——以天主教文献为中心 /354

白井纯:从《落叶集小玉篇》部首归类论吉利支丹文献字体认识 /365

冈墙裕刚:作为日语教材的《文字のしるべ》的性质和价值 /384

李运博:傅云龙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兼谈傅云龙的日语观 /391

朴均辙:有关日本军队用语来源的研究——根据《五国对照兵语字书》及德日军队用语辞典 /405

高田智和:《大字典》的汉字处理 /422

安冈孝一:拓本文字数据库 /438

石塚晴通教授研究业绩目录(续:2005~) /452

唐炜:编后记 /458



敦煌学编

楼兰、敦煌加点本

石塚晴通

一、关于“加点”问题

标题上的“加点本”，就是指被“加点”的文献。“加点”、“点”这种用语有许多人听起来还不太习惯，就此问题笔者先作一下说明。阅读古文献的时候，为了帮助理解，在表示句号、逗号、段落、四声等在文献中加注一些文字、符号，这就叫作“加点”；而这些文字、符号则被称作“点”（“点”字作为动词时其含义与“加点”相当）。从广义上讲，包括表示发音的音注、表示语意的训注、概括段落的科文等的注记也称为“加点”。

这些被称作“加点”、“点”的用语，在现存的唐代文献的识语中（见下页的插图1、插图2、插图3）均可看到。此类文献由来很久，如S. 2577 妙法莲华经卷第八的卷末就有如下识语（参见插图1）：

余为初学读此经者不识句_レ文故冯点之亦不看科
段亦不论起仅多以四字为句若有四字外句者然点_レ始
之但是四字句者绝不加点别为作为惟委反别行作行闲更反
如此之流聊复分别后之见者勿怪下朱言错
点也

以上文献中有“加点”、“点”存在。事实上此文献中的句读点，其字不是此字的本来用法，而是表示为破音字点（后述）加点。S. 3663 文选卷第九的卷末识语中（参见插图2）有：

郑家为景点_レ讫



插图 1

S. 2577 妙法莲华经卷第八



插图 2

S. 3663 文选卷第九



插图 3

S. 6889 四分戒本疏卷第四

如上文所示,“(景)点”语存在。事实上此文献中的句读点、表示四声的点、字音注记等也都有加点。其中的“景点”可解释为“影点”,将点临摹,也就是说如果将加点临摹得很逼真的话,就进入了临摹继承阶段,这在日本被称作“移点”。奥书上的加点也应该被注意。S. 6889 四分戒本疏卷第四的卷末识语中(参见插图 3)有:

寅年十月廿日于东山接续及点勘并了

此处所示“点勘”存在,事实上此文献的句读点、科段等都被加点。“点勘”的意思就是校对勘正文字,像这样的校对勘正文字的用法是自古传来的。

二、中国加点本的变迁

其实,读文献的时候,为了帮助理解在文献中加点(注释),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就有了。纸本以前的木简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在那个阶段,表示段句的点、表示句子开头的点用墨点。现存的加点木简资料中的长句虽然没有发现,但是从古人阅读文章时使用的“句读”、“科段”上及木简的加点状态上可窥探出其重要性。现存的纸本文献属于3世纪的楼兰文献(书写本),从中也可以看到加点本。继承木简的加点形态,表示句读点、科段点的点加墨点,其中也有用朱点表示句读点的。

4世纪至10世纪的书写文献中有大量的敦煌文献,这些文献恰好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当然,敦煌地处中国的边远地区,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所以在调查这些敦煌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要考虑到当时中国文化中心地域及敦煌地域的历史情况。敦煌地域现存文献较少,南北朝时代的书写文献(其实也可以说是北朝系的东西)现存的相当多,加点本也不少,南北朝以前的加点文献几乎是断片和短文。到了南北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长文文献,经本、注释书也被人们所知,加点的性格及意义也清楚化了。此时期的“加点”也就是以“句读”和“科段”为中心,伴随着旁注等注记的存在。此时期的句读点是用朱笔加点的,而且朱点呈橙色和浅茶色,具有圆形的特征。另外,这种朱笔的句读点像后来的文献一样加点少,不详细,与其叫句读点不如叫句点。加点的原则以文字间的右横、小断落重合的时候,处于文字的中间,表示科段的加点,在段落的文头点的是墨点。此时的墨点大多具有用刚硬的鹿毛笔所写的三角形和雁金形的特征。加点的位置在分段落、改行时放在头部栏外,不分段、不改行时放在文字的中间。旁注、背书等的注记中有难解的注释、科文等,因为这些加点没有加点识语,其中也有关于加点的识语文献存在。S. 2732 维摩经义记卷第四,全卷有朱笔的句点加点,可以称为加点本,其卷末就有这样的识语存在(参见第18页的图9)。

维摩经义记卷第四 龙华二儒共校定也更比字一校也

大统五年四月十二日比丘惠龙写记流通(和本文同笔)

保定二年岁次壬午于尔锦公斋上榆树

下大听(德?)僧雅讲维摩经一遍私记(和本文别笔)

根据此文可以断定出本文是大统五年(539年)书写的,保定二年(562年)讲义时加的点,从整齐的加点形态看,全卷具有详细的加点,可以看出不是听讲者加的点,而是演讲者加的点(卷末识语中没有明确地记入加点的情况,此例子可判断出是唐代以后加的点,从朱点的颜色、加点的形态上看是6世纪的加点文献)。除文献以外,以同样的理由得知还有识语的加点本存在。另外,此时期的加点本中“一许”的识语很是明显,有相当数量。例如,从S.524胜鬘经疏上即可看到,它不仅句点上有朱笔加的点,而且卷末存在“一许”的识语(参见第14页的图5)。

延昌四年五月廿三日于京承明寺写胜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
受所供养许

根据上文可以得知这是延昌四年(515年或是564年)所写,而且“许”字也被广泛使用。那么为什么要用“许”字?“许”字是什么意思?不详。有这种识语存在的文献几乎都是加点本。笔者认为“许”字的深奥意思是传授许可的意思。由此推出必要的正确解释就应该加点。此外,还有许多“校竟”、“校已”、“校”等识语存在的加点本文献,本书在校对时也认为此文献为加点本,尤其是判断出此文献是私人学习用的。这个时期的多数加点本应该说都不是标准的文献,那么什么是标准的文献呢?我们都知道,加点本是供学习用的,本来就有私人的性格,所以说此时期的加点本不是标准的文献。另外,此时期的文献没有加点识语的存在很多,所以也不能称之为标准的文献。

标准的文献是在隋唐时期的书写文献时期出现的。当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加点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同时学习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加点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当然此时期的加点还是以“句读”和“科段”为基础,文献中的发音、语意的注记都很详细。另外,为了正确地解释、标出必要的破音字点,表示四声位置的新手法业已产生。中国四声的创始人是梁时期的沈约,关于此问题,汉译佛典的陀罗尼的注记及诗文的注记就是用通时的

眼光来看都可说明是沈约,及那个时代的产物。以前,曾传说四声点是从六朝传来,应该改变这种想法(因为自六朝后半期至7世纪前半期极多的文献中,加有四声点的文献竟然没有发现一例。另外,标有四声点记录的记述也没有)。到了7世纪后半期才发现了被称为四声点的源泉的形式加点。也就是说,其字的用法同原意,与本来的音不同(当时的记述,将这种用法称作“假借”),而现代用语则将它称为“破音字”,此用法造成的误解较少,为了避免造成误解,用朱笔将其字的中央及右横方加点(颜师古“匡谬正俗”第六卷中关于此加点法有记载)。前面第4页的插图1中显示的S.2577妙法莲华经卷第八的卷末识语所记述的“别为作为帷委反别行作行闲更反”中的“为”(帷委反),就是为了的意思(去声)，“行”(闲更反)就是“实行”等名词的意思(去声)。这段话的意思是指那时就有用朱点区别的论述。但此识语未有年号记载,实属遗憾。估计此文献的书写年代为7世纪末期前后,7世纪后半期的文献几乎都有学习后的痕迹,因此,可以看出有很多是同样的加点法。进入8世纪之后,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加点的变化及发展。也就是说,其字的用法同原意、本来的音虽不同,但表示的方法相同,这就是四声。所谓四声就是利用文字的四角,区别、加点。这种加点当初是按照时针的摆动方向而定的,右上方的位置是平声,右下方的位置是上声,左下方的位置是去声,左上方的位置是入声。(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的发字例中也有关于加点的记述。)后来,这种用法很快就变了,其结果是:左下方的位置变成了平声,左上方的位置变成了上声,右上方的位置变成了去声,右下方的位置变成了入声。这种加点不是单一的四声加点,而是表示其字用法的原意与本来的音不同,为了正确地解释加点是必要的。所谓单纯的四声点的加点法,是与原来意思脱节的,也就是以单纯的四声加点为目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做赘述。关于句读点的加点问题,南北朝时代详细加点的文献较少,与其说是句读点,还不如称为句点。隋唐时期详细加点的文献较多,其中有句点和读点不同的文献。比如S.687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传外传卷下中,句点在文字间的右上方,读点在文字间的中央,在加点上是有区别的(参见第20页的图13)。句读点一般用朱笔加点,但是文献中也有青蓝色点、黄色点、墨点等。从形态上看,初期的点都是整齐的圆形点,7世纪末期到8世纪开始,随着时代的变迁,细长的点渐渐多了起来。下面就表示科段的点进行论述。隋唐时期很多表示文献段

落的文头位置,都用朱笔的钩表示加点。另外,其段落的文头位置,有用朱笔的圆形、三角形的圈发、不同大小的点和各种各样的线来加点。根据大小的科段的细密化,可以判定出各种符号组成一体来进行加点。还有一些引用符号、旁注、头注及脚注,背面也可以看到注记。关于背面注记这个问题,前面也有涉及,南北朝时代也有此类文献(参见第 19 页的图 10)。语言的注释、音注在表记的正面,背面的注记场合和本文表记的左侧中出现的卷子的背面也会有注记(参见第 33 页的图 28 及第 36 页的图 31)。尽管南北朝时代的敦煌文献几乎全部可以说是接近北朝的佛典资料,可是从隋唐时期整个文献的比率上看有众多的佛典资料及数量相当的汉籍,这些文献可反映国家的统一,及中国中央文化的系统。总括全体,区别佛典文献与汉籍加点形态的不同是很困难的,但是为了正确地读解,在加点的做法上佛典与汉籍的场合是相同的。这种加点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随着注释的细密化,加点形态也趋向于详密。这个时期的加点本有加点识语的比率相对较少,因此,给文献上加点可看成是私人为读解而加的点。

吐蕃期以后的敦煌文献在性质上有些变化,也可以认为在加点形式上有所变化,这在加点用具的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句读点中有粗杂的符号,圈也用了许多。为表示科段,用朱笔做种种的花形符号来作加点是吐蕃期文献的特色(参见第 34 页的图 29、第 35 页的图 30),而且朱点的色以茶色的为最多。此时期反映汉籍细密高度的学习的加点文献相对来说较少,而佛典中详密的讲义、反映学习的文献却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 9 世纪中期法成的讲义方面的文献有很多,从讲义、学习的痕迹上真实地显示出加点的详细情况。从这些大量的加点本中,听讲者的笔录中记载着讲师的识语。但听讲者都用共同的符号加点,反映出多半属于共同的性质(有关法成关系的文献有上山大峻氏的卓论《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の研究(上)、(下)》,载《东方学报》第 38 册、39 册)。

也就是说,加点就是为了正确地读解汉文而从事的一项工作。根据读解的态度可以反映出加点形态的变迁。另外,因各个时代加点形态的不同,用具的材料也不同,这充分反映出加点的时代变迁。

这种加点的手法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又有了独特的发展。8 世纪奈良时代的文献有反映句读、科段的朱笔加点,到了 8 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初期

的文献,反点(语顺点)、假名点及具有日本独自开创的乎古止点开始出现。虽然说这是日本所用的加点,只是为解释日本语而产生的,是为了正确读解而需要的符号、注记等,但是加点的基本性格与中国的加点性格相同,并没有什么变化。日本训点本最古的纪年是大东急記念文库藏华严刊定记卷第五。如下面插图4及插图5卷末中识语到延历二年(783年)及七年(788年)的加点,及众人所知的朱笔的句读点及返点的加点形态,与中国的加点本酷似(用返点只是表示解释的顺序)。



插图4

大东急記念文库藏华严刊定记卷第五



插图5

大东急記念文库藏华严刊定记卷第五卷末

三、关于本号所收的加点本

1969年秋,笔者为了调查欧洲博物馆所藏的汉文古文献,先后走访了列宁格勒、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进行了一次访书旅行,调查的主要目标就是确认原本的加点情况。从复制本、胶卷至洗印照片上来寻找加点痕迹,并作整理工作,尽管在一直继续这项工作,可是仅从胶卷上是不容易找出朱笔的加点痕迹的,由此可见,对原本的调查是不可欠缺的。于